

明代鄉會試《尚書》義出題考察

——以考官出題偏重為主的討論

侯美珍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明代鄉、會試皆考三場，所試雖涵蓋詔、誥、表、判、論、策等內容，但首場以經文為題，闡發經義的制義，才是錄中與否的關鍵¹，由此可見明代科舉與經書的密切關係。在鄉、會試中，制義皆考七篇，《四書》義三題是共同必考；《五經》義包括《易》、《書》、《詩》、《春秋》、《禮記》，人各擇一經，試以四題。科舉考試重經書，一方面是朝廷尊崇儒家學說，推重經書的體現；一方面也認為備考讀經的過程，可涵養士子的品行，讀聖人之書，法聖人之行。

考試影響士子的讀書與學習，與學術、學風產生互動，無庸置疑。考官出題的考量、偏重，以及考生如何擬題、備考，都是影響甚大，值得探討的課題。因科舉學發展較遲，加上天一閣所藏大量載有三場題目的明代會試錄、鄉試錄，直至二〇〇七、二〇一〇年才得以印行，先前受限於文獻取得的困難，研究者搜集試題尚且不易，更遑論從事《尚書》義出題的考察。

近幾年學界對明代經學與科舉的研究，雖略有關注，但起步未久。向來對明代《尚書》與科舉的有關論述，大都是述及蔡沈(1167-1230)《書集傳》在明代

本論文初稿於二〇一五年四月「第九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感謝會議講評人蔣秋華老師斧正；並感謝《集刊》兩位匿名評審推薦及賜教，讓筆者得藉以修補拙文闕漏。

¹ 偏重制義，請參拙作：〈明清科舉取士「重首場」現象的探討〉，《臺大中文學報》第23期（2005年12月），頁277-322。

爲功令所尊，探討蔡《傳》對《尚書》學的發展、對《尚書》科舉用書的出版產生影響時，間或論及。至於扣緊出題、試題的探討，目前僅見陳恆嵩〈明代科舉與《尚書》題目——以《明代登科錄彙編》爲考察中心〉、〈明代會試《尚書》義試題探析〉兩文²。

陳恆嵩是《尚書》研究的專家，又是明代《尚書》與科舉跨領域研究的前輩，兩文對明代《尚書》與科舉問題的探討，有開創之功。前者由其副標，可見只以《明代登科錄彙編》爲研究範圍，後者又僅限於會試題，雖爲披荊斬棘之作，但因寫作時試錄等文獻影印流傳未久，加上主題、篇幅等因素局限，以致兩文所搜集，據以立論的《尚書》試題文本，較爲不足³。故本文承續陳恆嵩兩文探討的議題，增補天一閣及其他存世鄉、會試錄，進行更全面的分析探討。

本論文採歷史文獻分析法及統計法進行研究，由鄉、會試《尚書》義試題的整理、統計出發。在文獻的取材上，主要仰賴明代的鄉、會試錄及相關典籍。然而，探討的雖是明代《尚書》與科舉的問題，但考試經書由來已久，間或上溯明代以前文獻；清代科舉考試多承明制而修正，優劣得失近似，或取清代相關資料補充論證，亦在所難免，勢所必須。

本論文章節安排，首先說明鄉、會試錄《尚書》義試題的搜集情況，各時期試錄，試題之分布，以交代文獻的來源，立論的根據。接著對試題進行統計與分析，據《尚書》五十八篇出題分布的數據，還原考官出題的傾向、偏重，並解釋各篇章經常或罕見出題之故，以供後續研究者備考，經學的傳習與教育、科舉用書編纂，各經出題比較等課題之憑藉。

² 陳恆嵩：〈明代科舉與《尚書》題目——以《明代登科錄彙編》爲考察中心〉，收入丁原基等主編：《第一屆中國古典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聖環圖書公司，2010年），頁248-270；〈明代會試《尚書》義試題探析〉，爲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一—二日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儒道國際學術研討會（六）：明清——開展二十世紀國學研究新視野」會議發表之論文。

³ 兩文雖各分五章，扣掉〈前言〉、〈結論〉，主論各有三章，但或概介明代科舉制度的設立及其意涵，或說明鄉、會試考試的內容，或探討科舉對經學、經典教育的影響，或申述考試造成的文體、學術之流弊，聚焦於《尚書》試題分析者僅各有一章。所獲致的結論爲：「〈皋陶謨〉、〈說命〉、〈大禹謨〉、〈畢命〉等篇出題頻率最高，最受考官重視。」（丁原基等主編：《第一屆中國古典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269）會試「出題數量最多者爲：〈皋陶謨〉、〈洪範〉、〈說命〉、〈堯典〉、〈大禹謨〉、〈立政〉等六篇最多」（見陳恆嵩：〈明代會試《尚書》義試題探析〉，頁11）。天一閣所收鄉、會試錄，爲《明代登科錄彙編》七倍以上，鄉試題又爲會試的五倍有餘，兩文因資料取材局限，統計結果稍有出入，故有重新撰文探討的必要。

二、鄉會試錄與《尚書》義試題的搜集

明代鄉、會試皆三年一考，三場考試的科目、文體，鄉、會試的規定也是一致。會試錄是會試結束，主考負責編纂的會試記錄文獻，《皇明貢舉考》言會試錄的編輯體例是：「首會試錄序，次考試官、執事官，次三場題目，次中式舉人，次舉人程文，終後序。」⁴鄉試錄性質和體例亦相同。鄉、會試錄所附三場題目及載有篇題的《尚書》程文，即是筆者搜集《尚書》試題時，主要賴以取資的對象。

試錄並不像其他流傳的書籍，擁有較多的讀者，會一再刊印。即使能夠流傳至今，也常被典藏在古籍善本室中，觀閱不易。一九六九年臺灣學生書局編印《明代登科錄彙編》⁵，影印當時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及代管國立北平圖書館所藏之登科錄、會試錄、鄉試錄、武舉錄等共六十六種，其中含會試錄十種、鄉試錄三十一種。收藏明代科舉文獻豐富的天一閣，於二〇〇七、二〇一〇年將收藏的會試錄、鄉試錄印行⁶，會試錄收有三十八種，鄉試錄收有二七二種之多⁷。二〇一〇年出版的《中國科舉錄彙編》收錄明代二十九種科舉錄，其中會試錄三種，鄉試錄十三種⁸。以上諸叢書所收，僅有少數重複。爲使試題搜羅更齊全，又查閱了《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⁹等書之著錄，查詢未影印流傳，僅收藏在臺灣、北京、吉林大學、淄博、上海、南京、常熟、日本內閣文庫、美國國會圖書館等多處圖書館古籍善本室所藏的鄉、會試錄四十六種¹⁰。

零星散見於文集，各種文獻者，如張朝瑞(1537-1609)《皇明貢舉考》卷

⁴ [明]張朝瑞：《皇明貢舉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第828冊，影印明刻本），卷1，頁55b，〈會試錄〉條。

⁵ 臺灣學生書局編輯部輯：《明代登科錄彙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年）。

⁶ 寧波市天一閣博物館整理：《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會試錄》（寧波：寧波出版社，2007年）；《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鄉試錄》（寧波：寧波出版社，2010年）。

⁷ 天一閣所印共有四十八函二七七冊，因第二十一函第三至六冊，爲《國朝河南舉人名錄》，故實爲二七四種。除《國朝河南舉人名錄》外，第三十四函第四冊《嘉靖七年浙江同年錄》亦非載有試題的鄉試錄，故正文言鄉試錄收有「二七二種」。

⁸ 姜亞沙等主編：《中國科舉錄彙編》（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10年）。

⁹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¹⁰ 補查的各圖書館館藏鄉、會試錄的情形，參拙著：《明代鄉會試《詩經》義出題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4年），〈鄉會試錄與試題的搜集〉，頁55-57。經查詢的試錄共四十六種，不提供調閱或無試題者有十四種，可補入試題的試錄共三十二種。

二至卷九載錄了不少會試題，其中嘉靖五年 (1526)、十七年 (1538)，萬曆十一年 (1583) 等三科¹¹，未有傳世之會試錄，可藉此補足此三科試題。唐寅 (1470-1523) 文集中，收有弘治十一年 (1498) 應天鄉試錄部分內容，可錄得《尚書》試題¹²。顧炎武 (1613-1682) 《日知錄》也引述天啓七年 (1627) 順天鄉試一題《尚書》義¹³。

截至目前，共搜得《尚書》六十二科會試題，共二三五道試題；各科各區鄉試三三六種¹⁴，共一三三九道試題。本文搜得各時期會試科數、試題數，如表一所示。

表一 所搜得之各時期會試科數及試題數

年號	科年	科數	試題數
洪武	4、24、30	3	3
建文	2	1	4
永樂	13	1	4
宣德	5、8	2	8
正統	元、4、7、10、13	5	20
景泰	2、5	2	8
天順	元、4、7	3	12

¹¹ 除此三科，《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會試錄》中，雖收了萬曆五年 (1577)、八年 (1580) 的會試錄，但脫漏、不全，裝訂時兩本間或相錯、混淆，《皇明貢舉考》此兩科的試題頗具參校、補足的價值。

¹² [明]何大成輯：《戊午鄉試題名錄》，收入[明]唐寅：《唐伯虎先生全集·唐伯虎先生外編續刻》（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9年，影印明萬曆四十二年[1614]刊本），卷12，頁1b。該書錄有弘治十一年應天府鄉試試題及榜單，唐寅為該科解元。

¹³ 題目為〈洛誥〉之「我二人共貞」，見[清]顧炎武著，[清]黃汝成集釋，樂保羣、呂宗力校點：《日知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卷16，頁950，「題切時事」條。田藝衡曾論及嘉靖二十二年 (1543) 山東鄉試錄「以『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之文，結用『作聰明亂舊章』等語」，致「皇上震怒，以為誹謗」，考官罹禍事。而詳考該科試錄，題目應為：「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本論文「罕見出題篇章的分析」一節，引張寧言景泰二年 (1451) 會試入場，「及得題，果『織皮崑崙』云云，然經查會試錄所載，題目應作「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此題乃顧氏討論出題與時事之關係引及，目的不在完整呈現題目，有鑑於筆記等史料引述常大而化之，故雖晚明出題常出短題，但對此題的完整性，仍需有所保留。田說見[明]田藝衡：〈非文事〉，《留青日札》（《續修四庫全書》第1129冊，影印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刻本），卷37，頁4a-b。按：田藝衡生卒年不詳，父田汝成 (1503-1557)，為嘉靖五年進士。

¹⁴ 會試三年一科，而且僅有此科，故可徑用「科」稱之。鄉試三年一科，每一科又分南北直隸、各直省考試，不宜說「三三六科」鄉試題。正確的說法應是明代各科各區三三六場次鄉試《尚書》試題。試題並非全錄自鄉、會試錄，或取自《皇明貢舉考》、文集等文獻，但以錄自試錄為主，為方便稱述，行文中多概言之。

成化	2、5、8、11、14、17、20、23	8	32
弘治	3、6、9、12、15、18	6	24
正德	3、6、9、12、15	5	20
嘉靖	2、5、8、11、14、17、20、23、26、29、32、35、38、41、44	15	60
隆慶	2、5	2	8
萬曆	2、5、8、11、14、26、29、41、47	9	32

明代共舉行八十八科會試¹⁵，以上掌握的試題科數有六十二科，約占百分之七十。《尚書》義試題有四道，因洪武四年(1371)考試內容與後世不同，僅出一題《尚書》題，洪武二十四年(1391)、三十年(1397)，因文獻闕漏，僅自《皇明貢舉考》各錄得一題。萬曆二十九年(1601)、四十七年(1619)，因會試錄缺試題頁，僅從程文中各錄得二題。故所搜得的六十二科會試的出題數有二三五題。

學者曾藉《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天一閣書目彙編》統計，共得明代各科各區現存鄉試錄三一三種¹⁶，筆者再加搜索，目前共錄得三三七種，其中成化七年(1471)應天、隆慶四年(1570)浙江，試錄之試題頁缺失，僅從程文錄得二題。萬曆四十六年(1618)福建鄉試，亦僅錄得二題¹⁷。總共搜得三三七種、計一三三九題，其分布狀況詳見表二¹⁸。

表二 所搜得之各時期各科各區鄉試數及試題數

年號	科年	兩京、各直省考區	鄉試數	試題數
建文	元	應天	1	4
永樂	12	福建	2	8
	18	浙江		
宣德	元	福建	1	4
景泰	元	順天、應天	3	12
	4	福建		
天順	3	江西	5	20
	6	應天、山東、山西、浙江		

¹⁵ 或言會試有八十九科、九十科，此乃因洪武三十年劉三吾等主持會試，多取南人，落第士子抗議，朱元璋又下令重試，另行錄取，稱為「春夏榜」或「南北榜」，此實為「一科兩榜」。又或因多列了「崇禎十五年壬午科」之故，此原是「崇禎十三年(1640)庚辰賜特用出身科」，「十五年」是碑末所署立碑之時，且該科所錄取的二六三人是特用舉貢，非進士，似不宜計入。參陳長文：〈崇禎十三年賜特用出身科科年考實——兼談明代進士題名碑的立石問題〉，《文獻》2005年第3期，頁168-175。

¹⁶ 錢茂偉：《國家、科舉與社會——以明代為中心的考察》（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頁241-245。

¹⁷ 該試錄未傳世，錄自〔明〕丁紹軾：《丁文遠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四庫未收書輯刊》第5輯第25冊，影印明天啓刻本），《外集》，卷2，頁15a-17b，所收《福建鄉試錄》（原注：「萬曆戊午科」）之程文。

成化	元	山東、四川	33	130
	4	應天、浙江、廣東		
	7	應天、陝西、湖廣、浙江、廣東、廣西		
	10	順天、應天、山東、陝西、江西、浙江、廣東		
	13	順天、應天、江西、浙江		
	16	順天、應天、山東、湖廣、浙江		
	19	山東、浙江		
	22	山西、河南、浙江、廣東		
弘治	2	山東、江西、湖廣、廣東	32	128
	5	順天、應天、山西、江西、湖廣、浙江、廣西		
	8	山東、河南、陝西、福建、廣東		
	11	順天、應天、河南、陝西、湖廣、福建		
	14	順天、應天、河南、江西、福建、雲貴		
	17	順天、山東、陝西、浙江		
正德	2	順天、應天、山西、河南、江西、浙江、廣東、廣西、雲貴	39	156
	5	順天、應天、浙江、福建、廣東		
	8	順天、應天、山東、山西、河南、四川、浙江、福建、廣西		
	11	順天、應天、山東、山西、陝西、江西、湖廣、浙江、福建		
	14	應天、山東、山西、河南、湖廣、廣東、廣西		
嘉靖	元	應天、山西、河南、江西、浙江、雲貴	131	524
	4	順天、山東、陝西、江西、浙江、雲貴		
	7	順天、應天、山東、河南、江西、湖廣、浙江、福建		
	10	順天、應天、山西、河南、湖廣、雲貴		
	13	順天、應天、河南、江西、浙江、福建、廣東、雲貴		
	16	順天、應天、山西、河南、陝西、四川、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 ¹⁸		
	19	順天、應天、山東、河南、四川、江西、湖廣、廣東		
	22	順天、應天、山東、河南、四川、江西、湖廣、浙江、廣東		
	25	順天、應天、山西、河南、四川、江西、湖廣、浙江、福建、廣東、雲南、貴州		
	28	順天、應天、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浙江、福建、廣東、廣西		
	31	順天、應天、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江西、湖廣、福建、廣東、貴州		
	34	順天、應天、山東、山西、河南、陝西、雲南、貴州		
	37	順天、應天、山東、河南、陝西、江西、湖廣、浙江、廣東		
	40	江西、浙江、廣東、廣西、貴州		
	43	應天、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雲南		

¹⁸ 貴州士子原至湖廣就試，因至雲南較近，宣德元年(1426)，令貴州士子至雲南就試，原僅稱《雲南鄉試錄》，弘治八年(1495)，奏准試錄改稱《雲貴鄉試錄》。嘉靖十四年(1535)又奏准貴州獨立開科，故嘉靖十六年(1537)才會出現雲南、貴州各有一試錄的情形。

隆慶	元	順天、應天、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浙江、福建	21	82
	4	順天、應天、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廣西、貴州		
萬曆	元	順天、應天、山西、河南、陝西、四川、湖廣、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	61	242
	4	順天、應天、山東、山西、河南、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		
	7	順天、應天、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雲南		
	10	順天、應天、山東、山西、陝西、四川、江西、湖廣、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		
	13	山東		
	22	山東、浙江		
	25	應天		
	28	福建		
	34	河南、浙江		
	37	順天、江西		
	46	福建		
天啓	元	山西	5	17
	4	廣西、雲南		
	7	順天、江西		
崇禎	3	應天	3	12
	6	四川		
	12	陝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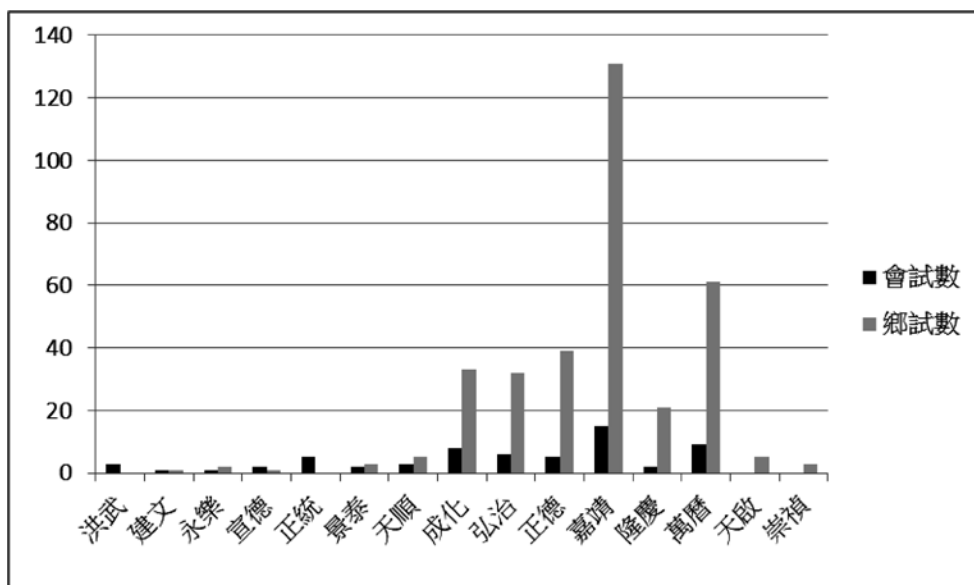
明代自洪武三年(1370)至崇禎十五年(1642)舉行了九十科鄉試¹⁹，明初直隸及各直省考區迭有調整、更動，九十科鄉試中確知舉行鄉試者，共一二八〇場次²⁰。目前搜得的三三七種，約占鄉試總場次的百分之二十六，少於會試約占百分之七十的場次，最主要原因是會試拔擢的是更高一等的人才，眾所矚目，會試錄是全國獨一無二，自然較鄉試錄更顯重要，也較容易流傳、搜集。

明代鄉、會試錄最重要的搜集者、典藏處為范欽(1506-1585)天一閣。范氏為嘉靖十一年(1532)進士，卒於萬曆十三年(1585)²¹，故明中葉至萬曆十年(1582)間的試錄搜羅較豐富。范氏卒後至明亡，因缺乏如范氏用心搜集者，故這期間的鄉、會試錄傳世較少。以下據表一、表二之數據，藉由直條圖，以期能更具體呈現搜得的各時期鄉、會試數之分布及比較。

¹⁹ 鄉試較會試多二科，是因明初天下初定，需才孔亟，洪武三、四、五年(1372)，接連舉行鄉試，而會試僅於洪武四年舉行一次之故。

²⁰ 詳參拙著：《明代鄉會試《詩經》義出題研究》，頁62-63處之說明及考辨。

²¹ 范氏天一閣所藏試錄，以明中葉至萬曆初年較豐富，所藏明會試錄止於萬曆八年(1580)，鄉試錄止於萬曆十年。范氏卒於萬曆十三年，後續僅收有十科萬曆中葉後、崇禎年間的進士履歷便覽。



圖一 所搜得各時期鄉、會試數分布及比較

因文獻散佚等緣故，無法網羅每一科試題，掌握的科數有限，但六十二科、二三五道會試題，及三三七種一三三九道鄉試題，合計一五七四道試題，已十分可觀，當可藉以考察、分析當時《尚書》出題的各種現象。

三、《尚書》義四題的組成與分布

考察試題的排序，大都依《尚書》五十八篇先後次序。目前所知，僅建文二年(1400)會試四題次序為：〈商書·仲虺之誥〉、〈周書·旅獒〉、〈虞書·大禹謨〉、〈商書·伊訓〉，排序參差，較屬例外。

每次所出四道題，皆出自不同篇章，並未見如《禮記》考試，同一篇重複命題的現象²²。《尚書》依時代先後，按〈虞書〉、〈夏書〉、〈商書〉、〈周書〉等四類為序編排，以下將藉表三、表四，分別呈現會試與鄉試在各時期試題

²² 如〈樂記〉，是《禮記》考試最重要、最常出題的篇章。明中葉後慣見於四題中出一題〈樂記〉，也偶見重複於〈樂記〉命題者，如：建文二年會試出三題〈樂記〉，永樂十三年(1415)、宣德五年(1430)會試皆出二題〈樂記〉。參拙作：〈明代鄉會試《禮記》義的出題及影響〉，《臺大中文學報》第47期(2014年12月)，頁89-138。

的組成與分布。

表三 各時期會試四題的組成與分布²³

	建文	永樂	宣德	正統	景泰	天順	成化	弘治	正德	嘉靖	隆慶	萬曆	合計
虞夏商周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虞夏周周	0	0	0	0	0	1	0	0	0	4	1	1	7
虞商周周	0	0	0	1	0	1	5	6	5	11	1	6	36
夏商周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虞周周周	0	0	1	1	0	0	2	0	0	0	0	0	4
夏周周周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商周周周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其 它	1	1	1	2	0	1	1	0	0	0	0	0	7
總 計	1	1	2	5	2	3	8	6	5	15	2	7 ²⁴	57

表四 各時期鄉試四題的組成與分布²⁵

	建文	永樂	宣德	景泰	天順	成化	弘治	正德	嘉靖	隆慶	萬曆	天啓	崇禎	合計
虞夏商周	0	0	0	0	0	2	4	0	4	0	0	0	0	10
虞夏周周	0	0	0	0	2	6	7	32	24	0	14	1	1	87
虞商周周	0	1	1	1	2	18	18	6	101	11	46	3	2	210
夏商周周	0	1	0	0	0	1	0	1	2	9	0	0	0	14
虞周周周	0	0	0	0	0	4	1	0	0	0	0	0	0	5
夏周周周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商周周周	0	0	0	0	1	0	1	0	0	0	0	0	0	2
其 它	1	0	0	2	0	0	1	0	0	0	0	0	0	4
總 計	1	2	1	3	5	32 ²⁶	32	39	131	20 ²⁷	60 ²⁸	4 ²⁹	3	333

就表三、表四觀察，可見明代初期出題，較無規範也較自由。自正德年間始，偏向四種組成模式：「虞夏商周」、「虞夏周周」、「虞商周周」、「夏商周周」。自隆慶年間始，僅偏重三種組成模式：「虞夏周周」、「虞商周周」、「夏商周周」。四題的組成模式，以「虞商周周」最頻見，不管是會試或鄉試，比例皆高達百分之六十三。據兩表也顯然可見〈周書〉最常出題。

²³ 洪武原搜得三科會試題，但洪武四年出題不同於後世，只有一題《尚書》義，洪武二十四、三十年，僅自《皇明貢舉考》各錄得一題，由於四題不全，無法得悉其組成，兼以未錄得天啓、崇禎年間會試題，故三時期的欄位闕如。

²⁴ 萬曆原搜得九科，但二十九、四十七年，僅自程文各錄得二題，故作七科。

²⁵ 由於未錄得洪武、正統年間鄉試題，故兩時期的欄位闕如。

²⁶ 成化原搜得三十三種，但七年應天鄉試，僅自程文錄得二題，故作三十二種。

²⁷ 隆慶原搜得二十一種，但四年浙江鄉試，僅自程文錄得二題，故作二十種。

²⁸ 萬曆原搜得六十一種，但四十六年福建鄉試，僅自程文錄得二題，故作六十種。

²⁹ 天啓原搜得五種，但七年順天鄉試，僅自《日知錄》錄得一題，故作四種。

《尚書》五十八篇中，〈周書〉多達三十二篇，超過全書之半，就比例而言，出二題〈周書〉題，確屬合理、適當，故四題中，慣見〈周書〉出二題，出三題者也不在少數。綜觀鄉、會試四題俱全的三九〇次出題中，全都出過〈周書〉題，無一例外，僅出一題者十九次，出二題者三五七次，出三題者十四次。再進一步考察未計入表三、表四，四題未全的九次出題，僅洪武四年、二十四年會試及萬曆四十六年福建鄉試未見〈周書〉題，其餘六次皆有。換言之，筆者所搜得的鄉、會試三九九次的考題中，僅有三次未見〈周書〉題，這三次可確定未出〈周書〉者，為洪武四年僅出一題為〈虞書·皋陶謨〉；其他洪武二十四年會試和萬曆四十六年福建鄉試兩次，倘四題俱全，未必無〈周書〉題。

以鄉、會試相比較，各種組合多寡的趨勢、變化相近，但包含〈夏書〉的「虞夏商周」、「虞夏周周」、「夏商周周」三種組合，在比例上，鄉試皆較會試高，尤其是「虞夏周周」最為明顯，在會試僅有七次，只占百分之十二；在鄉試多達八十七次，占百分之二十六，比例超過一倍。最主要是〈夏書〉雖有四篇，但絕大多數出自〈禹貢〉（詳後文），〈禹貢〉是中國「最早的一篇經濟地理文章。以貢賦為綱，按河流劃分全國為九個地區，所謂九州。分列各地區的山川、地勢、土壤、植物、水路交通和產物」³⁰。與黃河、長江流域一帶諸多行省區域的古代地理相關，固當為鄉試所重。反觀在會試中，倘出「海、岱惟青州」一段，似獨厚山東考生；出「淮、海惟揚州」一段，似又圖利了江南一帶舉人。會試必須考量到各區域的公平性，故審慎的考官，出〈禹貢〉中涉九州地理的經文，可能會有猶豫，在鄉試則無此顧慮。考察〈禹貢〉出題的情形，亦可發現各行省之鄉試，頗偏愛出與該省地理有關的經文³¹。且〈禹貢〉中「江漢朝宗于海」、「九州攸同」、「四海會同」、「訖于四海」等經文，傳達出地方對王朝治理的頌美、臣服，故在鄉試中更頻見出題。

再以下表，詳細呈現表三、表四「其他」一類組成的情形。

³⁰ 蔣善國：〈〈禹貢〉的著作時代〉，《尚書綜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198。

³¹ 如山東鄉試出〈禹貢〉題共有七次，其中出兗州、青州等與山東地理有關經文者，就有四次，含：成化元年（1465）「導沅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嘉靖二十二年「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隆慶四年「浮于濟、漯，達于河」、萬曆四年「嶠夷既略，淮、淄其道」。

表五 「其他」類出題的情形

科 別	《尚書》義 4 題的組成
建文元年應天鄉試	虞 / 虞 / 商 / 周
建文 2 年會試	商 / 周 / 虞 / 商
永樂 13 年會試	虞 / 虞 / 商 / 周
宣德 5 年會試	虞 / 虞 / 商 / 周
正統元年會試	虞 / 商 / 商 / 周
正統 4 年會試	虞 / 商 / 商 / 周
景泰元年順天鄉試	虞 / 虞 / 周 / 周
景泰 4 年福建鄉試	商 / 商 / 商 / 周
天順 7 年會試	商 / 商 / 周 / 周
成化 8 年會試	虞 / 虞 / 周 / 周
弘治 17 年山東鄉試	虞 / 商 / 商 / 周

被歸入「其他」類者，主要是因出題的組成模式較罕見，有別於明中葉後注重在四類中力求均衡出題的考量，虞、夏、商、周各書，篇數分別有五、四、十七、三十二篇，懸殊甚大，「其他」類之出題，卻未能反映適當的比例分配。表五所列，〈虞書〉僅五篇，出二題的有五次；〈商書〉僅十七篇，出二題的也有五次，景泰四年 (1453) 福建鄉試，甚至從〈商書〉中出了三題。〈周書〉出二題的僅有三次，未有自〈夏書〉出題者。且景泰元年 (1450) 順天鄉試、景泰四年福建鄉試、天順七年 (1463) 會試、成化八年 (1472) 會試，這四次考試，皆僅自兩類中出題，過於集中。

「其他」類所收十一次考試，時代多為明中葉以前。明代前期能搜得的試錄數本就偏少（參圖一），又多被列入「其他」，可見前期出題較自由，尚未形成較一致的共識，比起中葉以後，也略顯出題分配不夠平均，有偏重〈虞書〉、〈商書〉的傾向。雖四題如何組成，功令未加規定，但明中葉後考官似乎逐漸形成一種出題默契，如常見的「虞商周周」等出題組成，無疑更合理、更符合一般期待。由此也可見科舉在實施過程中，逐漸調整、完善制度的努力。

四、《尚書》各篇、各類出題的情形

下表統計《尚書》各篇於會試、鄉試的出題數，續合計其總出題數，諸欄分別再輔以「排序」，以便掌握各篇在五十八篇中出題多寡、熱門的程度³²。

³² 在排序時，會試由於樣本數少，出題數相同者較多，凡出題數相同，則名次並列。如會試

表六 《尚書》各篇鄉、會試出題數及排序

類別	篇名	今古	會試出題		鄉試出題		鄉會合計	
			次數	排序	次數	排序	次數	排序
虞書	堯典	今	5	16	16	26	21	26
	舜典	今	9	7	73	5	82	5
	大禹謨	古	13	4	98	2	111	2
	皋陶謨	今	14	3	57	9	71	8
	益稷	今	19	2	85	3	104	3
夏書	禹貢	今	9	7	81	4	90	4
	甘誓	今	0	41	0	51	0	50
	五子之歌	古	0	41	2	40	2	42
	胤征	古	0	41	5	33	5	36
商書	湯誓	今	0	41	0	51	0	50
	仲虺之誥	古	7	11	16	26	23	23
	湯誥	古	2	32	5	33	7	33
	伊訓	古	3	26	17	23	20	27
	太甲上	古	3	26	11	29	14	29
	太甲中	古	3	26	7	32	10	31
	太甲下	古	3	26	22	21	25	22
	咸有一德	古	7	11	43	12	50	12
	盤庚上	今	1	33	5	33	6	34
	盤庚中	今	1	33	1	46	2	42
	盤庚下	今	1	33	2	40	3	39
	說命上	古	4	22	35	14	39	15
	說命中	古	3	26	32	17	35	17
	說命下	古	11	6	64	7	75	7
	高宗彤日	今	0	41	0	51	0	50
	西伯戡黎	今	0	41	0	51	0	50
	微子	今	0	41	0	51	0	50
周書	泰誓上	古	0	41	2	40	2	42
	泰誓中	古	0	41	1	46	1	47
	泰誓下	古	0	41	1	46	1	47
	牧誓	今	0	41	0	51	0	50
	武成	古	1	33	3	38	4	37
	洪範	今	22	1	135	1	157	1
	旅獒	古	5	16	26	20	31	20
	金縢	今	0	41	1	46	1	47
	大誥	今	0	41	4	37	4	37
	微子之命	古	0	41	3	38	3	39
	康誥	今	5	16	17	23	22	24
	酒誥	今	3	26	16	26	19	28
	梓材	今	4	22	10	30	14	29
	召誥	今	5	16	27	19	32	19
	洛誥	今	7	11	33	16	40	14

出九題的有〈舜典〉等四篇，並列第七。由於第七有四篇，故其次〈仲虺之誥〉等出七題者，排序並列第十一。

	多士	今	1	33	1	46	2	42
	無逸	今	4	22	30	18	34	18
	君奭	今	5	16	34	15	39	15
	蔡仲之命	古	0	41	0	51	0	50
	多方	今	1	33	2	40	3	39
	立政	今	12	5	66	6	78	6
	周官	古	9	7	46	11	55	10
	君陳	古	6	15	40	13	46	13
	顧命	今	0	41	0	40	0	50
	康王之誥	今	1	33	9	31	10	31
	畢命	古	7	11	48	10	55	10
	君牙	古	5	16	17	23	22	24
	罔命	古	4	22	22	21	26	21
	呂刑	今	9	7	61	8	70	9
	文侯之命	今	1	33	5	33	6	34
	費誓	今	0	41	2	40	2	42
	秦誓	今	0	41	0	51	0	50

就虞、夏、商、周四類出題進一步統計，則如下表：

表七 四類之鄉會試出題數與出題比例

類別	篇數	會試		鄉試		合計	
		出題數	比例%	出題數	比例%	出題數	比例%
虞書	5	60	25.5	329	24.6	389	24.7
夏書	4	9	3.8	88	6.6	97	6.2
商書	17	49	20.9	260	19.4	309	19.6
周書	32	117	49.9	662	49.4	779	49.5
合計	58	235	100	1339	100	1574	100

就這四類出題情況而言，不管是會試、鄉試，由多到少之排序皆同為〈周書〉、〈虞書〉、〈商書〉、〈夏書〉。唯一不同是〈夏書〉在鄉試時，顯然較會試更獲青睞，出題比例大幅提升。在前文已說明主要是因〈禹貢〉涉及九州地理，具頌美、順服朝廷領導之意，故更常為各行省鄉試偏愛。觀表六，〈夏書〉之〈禹貢〉，在會試只出九題，排序第七，鄉試卻出了八十一題，排序第四³³，顯見鄉試較會試更常自〈禹貢〉出題。觀表七，〈虞書〉雖在排序上居第二，但考量其

³³ 〈胤征〉會試未出題，排序四十一；鄉試出五題，排序三十三，看似較〈禹貢〉在排序上相差更大，但實則不然。因為會試樣本數少，〈胤征〉僅罕出而非全不出，倘能掌握一題，排序馬上躍升為三十三，鄉、會試排序就變得無別。遠不如〈禹貢〉在統計數據上，鄉、會試有明顯的距離。〈夏書〉鄉、會試出題之出入，主要在〈禹貢〉，而非〈胤征〉。

篇數僅有五篇，就出了三八九題，出題比例高達百分之二十四·七，可見這四類中，〈虞書〉才是科場出題最偏重的範圍，五篇中就有〈堯典〉、〈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四篇，位居出題前茅，這是常考的篇章，也是考生備考的重點。

《尚書》的流傳，有今文、古文之分，因孔穎達(574-648)據東晉梅賾³⁴所上五十八篇本作《尚書正義》，後代傳習多據此五十八篇本，明代功令所宗的蔡沈《書集傳》也不例外。五十八篇中，包含與原今文《尚書》相同的三十三篇及新增的二十五篇。新增的二十五篇古文《尚書》真偽之辨，可謂《尚書》學史的重大課題。

雖對梅賾古文《尚書》辨偽，至晚明梅鷟(ca. 1483-1553)、清初閻若璩(1636-1704)方達到高峰，然而始自宋代吳棫(ca. 1100-1154)、朱熹(1130-1200)，已開始懷疑梅賾古文《尚書》有偽作之嫌，四庫館臣在吳澄(1249-1333)《書纂言》提要中，對疑偽的歷程有簡要的回顧：

古文《尚書》自貞觀敕作《正義》以後，終唐世無異說。宋吳棫作《書禕傳》，始稍稍掇擊，《朱子語錄》亦疑其偽，然言性、言心、言學之語，宋人據以立教者，其端皆發自古文，故亦無肯輕議者。其考定今文、古文，自陳振孫《尚書說》始；其分編今文、古文，自趙孟頫《書古今文集注》始；其專釋今文，則自澄此書始。³⁵

因對古文《尚書》有疑慮，明末甚至有上奏疏提議僅考今文《尚書》者，毛奇齡(1623-1716)云：「崇禎十六年，國子助教鄒鏞疏請分今文、古文《尚書》，而專以今文取士為言。會京師戒嚴，不及報。」³⁶全祖望(1705-1755)亦云吳澄《書纂言》一出，「世人始決言古文為偽而欲廢之」，「近世詆古文者日甚，遂

³⁴ 梅賾，生卒年不詳，東晉初期時人。

³⁵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卷12，頁1a-b，「書纂言」條。

³⁶ [清]毛奇齡：《古文尚書冤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6冊），卷1，頁1a。鄒鏞生卒年不詳。[清]趙佑：〈尚書古今文說〉，《尚書質疑》（《續修四庫全書》第45冊，影印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刻《清獻堂全編》本）云：「先儒多疑古文《尚書》之偽，予嘗緝綜其說，蓋莫甚于元、明，至有橫加詆斥如闢異端，于其私刻止存今文二十八篇，而古文則全削去者；復有形諸奏牘，請專以今文立學取士者。」（上卷，頁1a）由於後續言及「西河毛氏《冤詞》」云云，所指亦應是鄒鏞上奏以今文取士一事。

謂當取草廬之書，列學官以取士」³⁷。因詆古文為偽，或遂提議科場當尊僅注今文之《書纂言》。

到底宋、元以來，對古文《尚書》的疑慮，是否對出題有所影響呢？新增二十五篇是否因偽書的質疑，在科場上遭到忽視？首先，統計今文、古文出題情形如下表：

表八 今文、古文出題數及比例

類別	今文尚書 33 篇		古文尚書 25 篇		出題數 合計
	出題數	比例%	出題數	比例%	
會試	139	59.1	96	40.9	235
鄉試	773	57.7	566	42.3	1339
合計	912	57.9	662	42.1	1574

從上表考察，不管鄉、會試，自今文出題的題數與所占總出題數比例，皆明顯遠逾古文，然而考量今文篇數有三十三篇，本較古文二十五篇多，這個比例並不能逕自推論為考官出題較重今文，反而可藉以得知：今、古文的出題比例，和原來今、古文《尚書》之篇數比例一致，可見考官出題，僅著意於經文之內容義理，並不存在今、古文真偽的考量。

譬如〈舜典〉在先秦時原與〈堯典〉合併一篇，後一分為二，並在「慎徽五典」前（即今〈舜典〉之篇首），加上原今文〈堯典〉所無的二十八字：「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舜典〉篇首這二十八字雖來路不明，但內容是對賢君的頌美，義理適合，故曾經出題³⁸。反觀〈舜典〉中載堯死之「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以及載舜死之「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皆未出題。可見考官取舍是以內容義理適合出題考量，對待古文二十五篇，亦是如此。

古文《尚書》的義理確實有足堪稱道者，萬斯同(1638-1702)嘗言：今文《尚書》中，〈堯典〉、〈舜典〉、〈皋陶謨〉、〈禹貢〉等，自無可議；然其餘或無深義，或義理不足取法。盛推古文《尚書》「文章典雅，義理深醇」、「理足詞醇」、「其言明白正大，如日月昭垂，無一篇不可為後世法」。又言：「使《尚書》而無古文，不當列於《五經》矣，安得頒之學宮，與《易》、

³⁷ [清]全祖望：〈讀吳草廬《書纂言》〉，《鮚埼亭集外編》，卷27，收入全祖望著，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1273。

³⁸ 嘉靖四十年(1561)廣西鄉試《尚書》義第一題為「濬哲文明，溫恭允塞」。

《詩》、《春秋》並重哉！」³⁹程廷祚(1691-1767)言古文《尚書》：「出最晚而行最橫，觀其一篇之中，嘉言讜論，層見疊出，令讀者歡欣鼓舞而忘倦，視伏《書》反若過之。」⁴⁰翁方綱(1733-1818)亦言古文《尚書》言「六府三事、九功九敘之政要，危微精一之心傳」，「諸篇皆聖賢之言，有裨於人、國家，有資於學者」，「義皆醇正」⁴¹。可見古文《尚書》之義理、文章，爲人所稱道，也因此科舉考試中，這些「義理深醇」的經文，仍常作爲試題。

五、考官出題的偏重

從表六來看，會試最熱門出題篇章，前六名依序爲：〈洪範〉、〈益稷〉、〈皋陶謨〉、〈大禹謨〉、〈立政〉、〈說命下〉，其次則〈舜典〉、〈禹貢〉、〈周官〉、〈呂刑〉並列第七。鄉試前十名依序爲：〈洪範〉、〈大禹謨〉、〈益稷〉、〈禹貢〉、〈舜典〉、〈立政〉、〈說命下〉、〈呂刑〉、〈皋陶謨〉、〈畢命〉。鄉、會試合計得出總出題數前七名與鄉試排序相同，第八、九名爲〈皋陶謨〉、〈呂刑〉，〈周官〉、〈畢命〉並列第十。其他各篇總出題數的排序亦多與鄉試相仿，蓋因鄉試搜得的題數爲會試的五·七倍，使得鄉試數據對總出題數有較大影響。

以上所言鄉、會試熱門的出題篇章，共十一篇，茲將其篇旨及經常出題段落（各舉兩例），列表整理如下：

表九 熱門出題篇章之篇旨、段落舉隅

篇名	今古	篇 旨	常出題段落舉隅
虞書 舜典	今	盛讚舜之人品，及爲君後巡行祭祀四岳、制定刑法、懲處四凶、舉賢授能的政績。	「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³⁹ [清] 萬斯同：〈古文尚書辨一〉、〈古文尚書辨二〉，《羣書疑辨》（《續修四庫全書》第1145冊，影印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刻本），卷1，頁14b-17a。

⁴⁰ [清] 程廷祚：〈雜論晚書二十五篇〉，《晚書訂疑》（《續修四庫全書》第44冊，影印清乾隆刻本），卷下，頁2a。

⁴¹ [清] 翁方綱：〈古文尚書條辨序〉、〈愚谷文存序〉，《復初齋文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455冊，影印清李彥章校刻本），卷1，頁4a；卷3，頁14a。此爲翁氏反對閻氏辨僞而發，暢言古文《尚書》之價值。

虞書 大禹謨	古	記述舜與大禹、伯益、皋陶討論政務，並言及舜禪讓禹，和禹征伐苗民開拓疆域之事。	「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兪，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虞書 皋陶謨	今	皋陶和禹討論如何行德政。皋陶認為應慎身、知人、安民，並任用九德之人，兢兢業業，注重倫常。	「翁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
虞書 益稷	今	禹向舜陳述治水之功績，強調注重國計民生，討論為君、為臣之道，並記述廟堂舞樂盛況，君臣唱和、共勉。	「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 「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夏書 禹貢	今	記述大禹治九州、山川之功績。涉及當時政治制度、行政區畫及交通、物產、貢賦等。	「九州攸同，四隲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商書 說命下	古	傳說為相，向武丁進言為君之道，應效法前賢，借鑒先王成憲，任賢為官。武丁讚伊尹、傳說等賢臣，使國家長治久安。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周書 洪範	今	武王克殷，問箕子治國方略，箕子告以天賜禹之為政九種大法。	「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周書 立政	今	周公回顧夏、商及周文王、武王選用官員的經驗，以告誡成王設官理政的準則。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周書 周官	古	周成王即位，向百官說明朝廷設官分職、居官之法則，勉勵官員兢兢業業，敬守官職。	「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周書 畢命	古	周康王冊命畢公治理成周，勉其繼承周公之經驗，以治理、教化殷商遺民。	「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周書 呂刑	今	周穆王言蚩尤濫刑而滅亡，堯用中刑而有天下，告誡執法者要勤政慎罰，當畏天而審慎，公正而明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這十一篇中，〈大禹謨〉、〈說命下〉、〈周官〉、〈畢命〉四篇為古文《尚書》，〈大禹謨〉尤其名列前茅，在會試位居第四，鄉試及鄉會試題合計，皆僅次於〈洪範〉，名列第二。此亦可佐證考官並未因宋、元以來，對二十五篇

古文《尚書》真偽的質疑而影響出題。

這些熱門出題篇章，共同的特色是：多頌美吉祥的字句，呈現君臣融洽、國泰民安的景象，如「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萬邦惟無斁」等經文。又如〈說命下〉文末，武丁讚揚傳說的輔佐，言有伊尹、傳說般的賢臣，國家才能長治久安，傳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傳說反將功勞歸美於君上，言將弘揚天子美好的教導，深諳君臣之道，也呈現君臣和樂的氣氛，兼有頌揚明代當時國君的言外之意，故「敢對揚天子之休命」，頻見於題目中，多達十三次⁴²。

《尚書》在諸經中，與施政最為相關，《荀子·勸學》云：「《書》者，政事之紀也。」《史記·太史公自序》曾謂：「《書》記先王之事，故長于政。」前賢如此看待《尚書》，後人所見略同。清聖祖(1654-1722)云：「蓋治天下之法，見于虞、夏、商、周之書，其詳且密如此，宜其克享天心而致時雍太和之效也。」⁴³也因與施政相關，故最為經筵進講所重，晚明陳懿典(1554-1638)指出：「六籍中獨《尚書》為經世之言，旃廈進講首重之。」⁴⁴朱鶴齡(1606-1683)亦言《尚書》為歷來經筵之首及：「《尚書》者，帝王之心法、治法所總而萃也。後世大典章、大政事，儒者朝堂集議，多引《尚書》之文為斷據，……列朝經筵進講，必首及《尚書》。」⁴⁵因《尚書》多攸關政務，故鄉、會試題中，除多頌美吉祥的內容外，也常見頌揚三代聖君賢臣，述及其德行、施政與功績等內容；或闡論設官任賢，或關乎刑獄、教化、治術等經文，這些內容多為儒家政治思想的根源，亦是後代君臣為政之指南、榜樣，極適宜作為試題，甄選未來的官員。

在五十八篇中，出題數最多者為〈洪範〉。明太祖(1328-1398)曾肯定：

⁴² 會試未見出題，鄉試出過的有以下十三次：成化四年(1468)浙江、成化十年(1474)應天、正德八年(1513)山東、正德十一(1516)年福建、正德十四年(1519)湖廣、嘉靖十六年順天、嘉靖二十五年(1546)應天、浙江、廣東、嘉靖二十八年(1549)廣東、廣西、嘉靖三十七年(1558)河南、萬曆十年福建。

⁴³ [清]清聖祖：〈御製日講書經解義序〉，[清]庫勒納等奉敕編：《日講書經解義》（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5冊），卷首，頁1b。序末署康熙十九年(1680)。

⁴⁴ [明]陳懿典：〈《尚書來青堂選義》序〉，《陳學士先生初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78-79冊，影印明萬曆四十八年[1620]曹憲來刻本），卷2，頁35a。「旃廈」指帝王讀書學習之所。

⁴⁵ [清]朱鶴齡：〈《尚書埤傳》序〉，《愚菴小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19冊），卷7，頁7a-9a。

「〈洪範〉一篇，帝王爲治之道也。所以敘彝倫，立皇極，保萬民，敘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而驗於人事。」並且「嘗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因自爲註」，在洪武二十年(1387)二月，《御註書洪範》告成⁴⁶。由開國之君對〈洪範〉之重視，可見其重要。楊廉(1452-1525)《洪範纂要》之〈自序〉亦曰：「《尚書·洪範》所陳，篤恭而天下平，聖神功化之極，盡在是矣！」「學者誠取〈洪範〉本篇沉潛玩味，則五行五事休咎福極之應，昭然可見。」⁴⁷〈洪範〉內容爲治國之大法，本適合出題，篇幅又多達一〇四二字，僅次於〈禹貢〉，出題時可取材的內容甚廣，故不論鄉、會試出題皆遙遙領先，共計出過一五七次。

接著從文體的角度，觀察考官的出題。《尚書》文體的分類，有不同主張，以六體、十體之分最常被提及⁴⁸。其中又以典、謨、訓、誥、誓、命之六體分類，最膾炙人口。北宋張表臣釋六體之特色云：

道其常而作彝憲者謂之「典」，陳其謀而成嘉猷者謂之「謨」，順其理而迪之者謂之「訓」，屬其人而告之者謂之「誥」，即師眾而申之者謂之「誓」，因官使而命之者謂之「命」。⁴⁹

對六體的特色，雖有大致的共識，但要落實將五十八篇歸類在《尚書》六體時，不免見仁見智。如〈堯典〉、〈大禹謨〉、〈伊訓〉、〈大誥〉、〈秦誓〉等，容易分類，並無疑議；如〈禹貢〉、〈五子之歌〉、〈胤征〉、〈洪範〉、〈旅獒〉、〈周官〉等篇，自古至今，主張各異，仍未形成確論。譬如出題數頗多的〈洪範〉、〈禹貢〉，孔《疏》特設「範」、「貢」類，單篇自成一類，蔡《傳》雖於各篇多標註文體，但如〈洪範〉、〈禹貢〉分類甚有爭議、棘手者，

⁴⁶ [明]李景隆等：《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年），卷180，頁2727-2728，洪武二十年二月甲辰載。

⁴⁷ [清]朱彝尊撰，林慶彰等主編：《經義考新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卷97，頁1808，「洪範纂要」條。

⁴⁸ 論《尚書》文體者不少，如以下數篇皆曾論及：于雪棠：〈《尚書》文體分類及行爲與文本的關係〉，《北方論叢》2006年第2期（總第196期），頁8-11。陳贊：〈《尚書》「十體」的文體學價值〉，《湖南社會科學》2007年第3期，頁145-148。程元敏：〈尚書之體裁〉，《尚書學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8年），頁63-90。朱岩：〈尚書的六體〉，《尚書文體研究》（揚州：揚州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08年），頁9-42。

⁴⁹ [宋]張表臣：《珊瑚鉤詩話》（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78冊），卷3，頁13a。張表臣，生卒年不詳，北宋末年人。

則或略過不言文體歸屬。《尚書》學專家程元敏教授主張將〈禹貢〉、〈洪範〉歸在「謨」類，朱岩認為「這二篇屬於『典』類殆無疑問」，于雪棠則將兩篇歸在「訓」類⁵⁰，於此可見其紛歧之一斑。

雖若干篇章的歸屬，仍存在歧異，筆者將其他較無歧見的篇章依六體稍加分類後，仍可看出一些訊息。首先，明顯可見「陳其謀而成嘉猷」的「謨」體，最受考官青睞，屬此類的〈大禹謨〉、〈益稷〉、〈皋陶謨〉，在鄉、會試合計總出題數上，分別位居第二、三、八，蓋因其內容多為賢君賢臣對治國、德政、君臣之道的討論。其次則為「道其常而作彝憲」的「典」體，〈舜典〉、〈堯典〉總出題數分別位居第五、二十六名。歸屬為「訓」、「誥」、「命」三體的篇章較多，各篇的出題數多寡也頗為懸殊，「訓」體中，有出題數位居第十二的〈咸有一德〉，但也有未曾出題的〈高宗彤日〉；「誥」體中，有〈立政〉、〈呂刑〉位居第六、九，但〈西伯戡黎〉、〈微子〉皆未曾出題；「命」體中，〈說命下〉、〈畢命〉位居第七、十，但〈蔡仲之命〉、〈顧命〉皆未曾出題。出題數明顯全面偏少的，當屬「誓」體，由於為戰前誓師之作，或指斥敵方，或嚴厲約束軍士，且一般篇幅較短，故多未曾出題，或僅寥寥數題（詳下節）。

六、罕見出題篇章的分析

明人論述科舉流弊時，常抨擊考官出題有所偏重，致考生取巧，備考時以刪經不讀為捷徑。如李維楨(1547-1626)云：

近來士子不務實學，如《易》之悔吝凶咎，《書》之〈金縢〉、〈顧命〉，《詩》之變〈風〉、變〈雅〉，《春秋》崩薨卒葬，《禮記》奔喪、問喪，以為諱而不談。⁵¹

此為李維楨任陝西提學時，對士子「不務實學」的觀察與感慨，言及《尚書》之〈金縢〉、〈顧命〉不讀。顧景星(1621-1687)〈復經學議〉則云：「治《書》

⁵⁰ 孔《疏》見〈堯典第一〉篇題下《疏》語，主張分作十體，除既有六體外，再設貢、歌、征、範四體。程說見程元敏：《尚書學史》，頁73、76；朱說見朱岩：《尚書文體研究》，頁33；于說見于雪棠：〈《尚書》文體分類及行為與文本的關係〉，頁10。

⁵¹ [明]李維楨：〈陝西學政〉，《大泌山房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50-153冊，影印明萬曆三十九年[1611]刻本），卷134，頁4a。

則略〈禹貢〉、〈顧命〉。」⁵²兩人所言皆較簡略，顧炎武論述較詳盡，在《日知錄》中抨擊科場不問實學但求速成，並述及諸經刪經不讀的情形，言選考《尚書》者：「《書》則刪去〈五子之歌〉、〈湯誓〉、〈盤庚〉、〈西伯戡黎〉、〈微子〉、〈金縢〉、〈顧命〉、〈康王之誥〉、〈文侯之命〉等篇不讀，……止記其可以出題之篇，及此數十題之文而已。」⁵³

將鄉、會合計，五十八篇中未曾出題及出題極少，總數僅〇至三次者，列表如下：

表十 《尚書》罕見出題篇目

類別	夏書		商書						周書											
篇名	甘誓	五子之歌	湯誓	盤庚中	盤庚下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金縢	微子之命	多士	蔡仲之命	多方	顧命	費誓	秦誓
今古	今	古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古	古	古	今	今	古	今	古	今	今	今	今
會試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0	0	0
鄉試	0	2	0	1	2	0	0	0	2	1	1	0	1	3	1	0	2	0	2	0

對照上表，可見李維楨言《尚書》之〈金縢〉、〈顧命〉，士子不讀，應是備考的實情。明末顧景星所言「治《書》則略〈禹貢〉、〈顧命〉」，考生將關乎成王去世的〈顧命〉略去不讀，並不令人意外，但〈禹貢〉出題數不少，見諸統計數據，〈禹貢〉出題可說位居前列，何以言「略〈禹貢〉」？

⁵² [明]顧景星：〈復經學議〉，《白茅堂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05-206冊，影印清康熙刻本），卷27，頁9a。篇題下原註：「崇禎十七年。」

⁵³ 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樂保羣、呂宗力校點：《日知錄集釋》，卷16，頁945-946，「擬題」條。晚清戴鈞衡（1814-1855）亦曾言及《尚書》不出題的範圍，云：「〈微子〉、〈金縢〉、〈多士〉、〈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康王之誥〉、〈呂刑〉諸篇，語意艱深，無殊盤詰。窮經者不求甚解，試士者不以命題，苟無古文諸篇，則斯經幾同廢棄。」[清]戴鈞衡：〈書傳補商序例〉，《書傳補商》（《續修四庫全書》第50冊，影印清刻本），卷首，頁3a-b。戴氏所言「試士者不以命題」者，其中〈君奭〉、〈立政〉、〈呂刑〉諸篇，明代頗常出題，是戴氏所言有誤，或晚清出題傾向，與明代不盡符合？[清]黎光閣主人輯：《經文夏造·書經》（臺中：文听閣出版公司，2011年《晚清四部叢刊·第五編》第1-6冊，影印清光緒十九年[1893]上海積山書局石印本），收錄了一四〇〇篇之範文，題目巨細靡遺，頗能反映戴氏所處的晚清《尚書》義出題情形。經考此書，〈微子〉諸篇，或未收範文，或僅聊聊數篇；而〈君奭〉、〈立政〉、〈呂刑〉卻分別收了三十九、四十一、二十七篇範文，雖不如〈洪範〉、〈舜典〉等熱門，但顯非「不以命題者」者。故戴氏所言略有欠妥，晚清出題偏重與明代也大致相同。

景泰五年(1454)進士張寧(1426-1496)，曾自述景泰二年會試前之夢境：

一老叟指謂余曰：「此崑崙山也。」凡三指三語，方欲詰問，忽驚悟，遽起呼家童索燭，取〈禹貢〉「織皮崑崙」，研省紬繹，因不復寐，亟趨試院。……及得題，果「織皮崑崙」，是年《書經》舉人多爲所窘。⁵⁴

景泰二年會試錄今尚存，《尚書》義第一題爲〈禹貢〉題「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由張寧之自述，顯見是難倒了不少應考的舉人。文獻又載：晚明夏允彝(1596-1645)之父夏時正(1560-1627)，具「強記」之本事，「於書一過即暗誦不遺」。雖夏時正所擇之本經爲《尚書》，「然俗師不習〈禹貢〉，獨弗授也。將就試一夕先生乃誦，且稽註傳質，明而主者以〈禹貢〉策士，先生獨弗誤」⁵⁵。由這兩筆一前、一後的記載來看，顯然可見鄉塾教師或不習、不授，即使選考《尚書》，考生也並非盡皆通讀、熟讀〈禹貢〉。此又何故？

〈禹貢〉篇幅長達一一九四字，於五十八篇中最長，蔡注〈禹貢〉也較他篇來得冗贅，如「九河既道」一句之註，對「九河」之考證，引經據典、長篇大論，頗難以卒讀。牽涉古代地理，不只是今人覺得不易解讀，朱熹(1130-1200)曾說：「〈禹貢〉一書所記地理治水曲折，多不甚可曉。」⁵⁶明英宗(1427-1464)亦言：「《書經》有難讀者，朕昔讀至〈禹貢〉及〈盤庚〉、周〈誥〉諸篇，甚費心力。」⁵⁷因讀〈禹貢〉甚費心力，就總出題數而言，雖位居前列，但考量其篇幅、難度，就備考的投資報酬率而言，並非屬名列前茅者⁵⁸。自然會有考生但求捷得、僥倖，逕將〈禹貢〉略去不讀，但由於〈禹貢〉也不屬罕考的篇章、出題數不少，較常出現的作法，應是略去其中較罕出題的部分經文、過於冗長的傳注，或以其他精簡適用的注解本取代，以求備考更有效率，並非略過〈禹貢〉全不讀。成化進士邵寶(1460-1527)自註「〈禹貢〉全書媿我師」詩句：

⁵⁴ [明]張寧：〈雜言〉，《方洲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47冊），卷26，頁20b-21a。

⁵⁵ [明]陳子龍：〈夏方餘先生傳〉，《安雅堂稿》（《續修四庫全書》第1387-1388冊，影印明末刻本），卷13，頁20b。

⁵⁶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00-703冊），卷79，頁1a。

⁵⁷ [明]李賢：〈天順日錄〉，《古穰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44冊），卷25，頁9b。

⁵⁸ 以表九熱門出題篇章以外的三篇比較，如〈咸有一德〉，共二八五字，出了五十題；〈說命上〉，共二四八字，出了三十九題；〈君陳〉，共三五五字，出了四十六題；〈禹貢〉既難，又多達一一九四字，僅出了九十題。兼顧篇幅和難度考量，讀〈禹貢〉的投資報酬率大不如以上三篇。

予十五時，從俞蒿菴先生受《尚書》，在諸生中獨不許予讀《禹貢撮要》，因舉武功治水事以期之。後三十年總督漕運，未能成功，於是乎媿焉。⁵⁹

可見生員讀〈禹貢〉節本是常態。又，明中葉曹安曾對考生應試「《書》讀《禹貢節要》」，表示不滿⁶⁰；嘉靖時孫緒（1474-1547）也指出：「業《書》者讀〈禹貢〉，惟讀《便蒙》。」又言弘治時有《禹貢節要》，在應試考生中風行，幾乎取代了蔡沈的〈禹貢〉傳⁶¹。指出的都是備考刪讀〈禹貢〉經傳的情形。

前引顧炎武所言刪經不讀的情形，雖較李維楨、顧景星全面，但不太準確，容易誤導今人。除〈甘誓〉、〈高宗彤日〉等多篇從未出題、出題極少者，顧氏未遑言及，論述稍欠完整外，顧炎武所舉刪去不讀的例子，如〈湯誓〉、〈西伯戡黎〉、〈微子〉、〈顧命〉，確實皆未出題；〈五子之歌〉、〈盤庚中〉、〈盤庚下〉、〈金縢〉也極少。但顧炎武言及之〈盤庚上〉、〈康王之誥〉、〈文侯之命〉，並不在罕見出題的篇目中，鄉、會試合計，三篇分別出過六次、十次、六次，出題次數雖不算多，絕非熱門，但也非可全刪去不讀者。

由於前期投入、參與科舉的人不如中、後期多，且中葉以前，出版業不如中、晚明蓬勃，加上時代愈早常導致文獻散佚愈嚴重等原因，故前期的科舉史料流傳有限。本論文的取材雖已儘量搜羅、關注明初的線索，但所援用仍以中、晚明後的文獻居多。以上論《尚書》刪經問題時，所引述的或為中期的曹安、孫緒之論，或為李維楨、顧炎武、顧景星等晚明時人之言，讀者或許會質疑：所謂刪經不讀，是否僅只是中、晚期的流弊，不當以此概論明初？

⁵⁹ [明]邵寶：〈歸興〉，《容春堂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58冊），《前集》，卷7，頁5b。〈歸興〉詩共六首，所引為第五首。俞鏜，舉人，任教諭，生卒年不詳。據[清]沈家本等修，[清]徐宗亮等纂：《（光緒）重修天津府志》（《續修四庫全書》第690-691冊，影印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刻本）所載，乾隆三十年（1765）舉人張發長，亦著有《禹貢撮要》（卷37，頁13b及卷45，頁10a）。顯然非成化時生員所讀之本。《經義考新校》卷九十四，錄有明代許多〈禹貢〉專著，其中所載刪節之作亦不少，如：林洪《禹貢節要》、郭餘《禹貢傳注詳節》、夏寅《禹貢詳節》、韓邦奇《禹貢詳略》、曾于乾《禹貢簡傳》、褚效善《禹貢詳節》、姜逢元《禹貢詳節》、黃翼登《禹貢注刪》、張睿卿《禹貢便讀》等，可見〈禹貢〉刪節、撮要之類的書，並不罕見。

⁶⁰ [明]曹安：《譚言長語》（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7冊），頁5b。按：曹安，生卒年不詳，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譚言長語」條，言其為正統九年（1444）舉人（卷122，頁20a），《譚言長語》自序署成化二十二年（1486）。

⁶¹ [明]孫緒：〈無用閒談〉，《沙溪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64冊），卷12，頁2b-3a。

首先要說明的是：明初試錄流傳雖有限，但詳考其出題偏重傾向與後期不異。再以筆者先前研究《詩經》出題情形類推，永樂、正統年間孫鼎(1392-1457)所纂科舉用書《詩義集說》，對經文的纂錄解說，反映出明初考官對三〇五篇出題的取捨，與明代鄉、會試統計數據出題傾向亦一致⁶²。再以元末明初陳雅言(1318-1385)《書義卓躍》考察，陳氏生於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元末動盪，避亂隱居，明初亂平，曾任教於永豐縣學，門人登第者甚多，卒於洪武十八年(1385)⁶³。楊士奇(1364-1444)言其書乃「專為科舉設」⁶⁴。今所見為正統年間莆田林瑱校正、汝州王本刊刻的《新編書義卓躍》影鈔本⁶⁵，據永樂十三年進士彭勗正統五年(1440)所作前序，卷末教諭陳珪所作後序，此乃為當時選考《尚書》者刊刻的科舉用書，顯見此書雖元明之際所編，至正統時期仍有其適用性。筆者統計此書對五十八篇擬題的多寡，與明代鄉、會試《尚書》出題傾向一致，如〈甘誓〉、〈湯誓〉、〈湯誥〉、〈盤庚中〉、〈盤庚下〉、〈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泰誓中〉、〈牧誓〉、〈金縢〉、〈文侯之命〉諸篇，《書義卓躍》略去、未有擬題，這些篇目，大都見於表十「《尚書》罕見出題篇目」中⁶⁶。可見出題偏重、刪經不讀，不是中、晚明獨有的現象。

總計《尚書》共有五十八篇，鄉、會試皆未見出題的有九篇，合計只出過一至三題共十一篇。由於試錄傳世有限、試題搜羅未全，這些統計數據僅大致反映各篇在科場出題上獲得重視的相對程度，尤其出題數偏少，非絕不可出的十一篇，雖談不上重要，但謹慎的考生，應該會擇要研讀，而非全部不讀。

分析表十這罕少出題二十篇之歸類和分布，可得到以下幾點認識：

(一) 未見〈虞書〉的篇章，可知〈虞書〉在出題、備考時，五篇全獲重視。

⁶² 拙著：《明代鄉會試《詩經》義出題研究·孫鼎《詩義集說》與科舉》，頁147-158；及附錄三：〈鄉會試出題與孫鼎《詩義集說》纂錄經文比較〉，頁273-278。

⁶³ 關於陳雅言世系、生平及《書義卓躍》一書的流傳，參蔣秋華：〈陳雅言與《書義卓躍》〉，收入傅永聚、錢宗武主編：《第三屆國際《尚書》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線裝書局，2015年），頁119-129。

⁶⁴ [明]楊士奇：《東里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38-1239冊），《續集》，卷16，頁23a，「書卓躍」條。

⁶⁵ [明]陳雅言：《新編書義卓躍》（明人景鈔正統年間汝州王本刊刻本，名古屋：蓬左文庫藏）。此為日本名古屋蓬左文庫所藏完整的六卷本，此書又有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明藍格鈔本，僅餘三卷，不全。林瑱、王本及後文之陳珪，皆為正統時人，生卒年不詳。

⁶⁶ 其中僅〈湯誥〉、〈文侯之命〉，不見於表十，兩篇明代鄉、會試出題數總計，分別只有七題、六題，亦屬出題較少者。

(二)〈夏書〉、〈商書〉、〈周書〉各有二、六、十二篇，占原有篇數的比例為：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三十五·三、百分之三十七·五，〈夏書〉比例最高，可見最不為出題所重。

(三)以今、古文考察，今文有十四篇，古文有六篇，分別占今、古文原有篇數的比例：百分之四十二、百分之二十四。古文《尚書》罕見出題、不受科場重視的比例，還較今文《尚書》低。再次證明，考官出題時，古文二十五篇並未因真偽的質疑，受到忽視、壓抑，主要仍取決於篇章經文的內容。古文《尚書》以其義理可取，故能與今文並駕。

分析罕見出題篇章之分布後，以下將就這二十篇的內容，探討其何以罕少出題。首先，將二十篇之內容主旨概括於下：

表十一 罕見出題篇章之篇旨

篇 名	篇 旨
甘誓	夏啓即天子之位，有扈氏不服，啓伐之，大戰於甘。戰前作〈甘誓〉，說明討伐之故，並嚴申獎懲，威嚇軍士。
五子之歌	夏啓之子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陳述大禹之誠，指責太康縱情遊樂，失道亡國，覆宗絕祀。
湯誓	夏桀虐政荒淫，商湯弔民伐罪，戰前作〈湯誓〉，說明伐桀之故，並嚴申賞罰。
盤庚中下	商王盤庚欲遷都殷邑，遭殷臣民反對，盤庚再三曉諭遷都之利，不遷之害。
高宗彤日	舊說以為殷高宗祭成湯事，今人研究以為商王祖庚彤祭高宗時，祖己誡王、訓導祖庚之記錄。
西伯戡黎	周文王征伐商之屬國黎國，祖伊恐，告誡紂王勿淫戲自絕於天，上天已不護佑殷商，將為周所戮。
微子	紂王淫亂失德，行將滅亡，不納微子諫言，父師勸微子棄紂遁逃。
泰誓上中下	周武王即位十三年，在孟津大會諸侯，伐殷前作〈泰誓〉，細數紂王之罪行。
牧誓	周武王率軍至牧野，伐紂前誓師之詞，譴責紂王之暴政，嚴申軍紀。
金縢	周武王滅商後二年，罹重病，周公作冊禱告請代武王而死，祝告緘於金縢。後管、蔡流言，成王疑周公。上天以雷電示警，成王發金縢，見周公之忠誠而出郊遠迎。
微子之命	微子去紂，武王滅商後，歸順成周，此為周成王冊命微子為宋國國君之命令及勉勵。
多士	周公代成王向殷商臣民發布之誥令，藉天命不佑暴君桀、紂之說，迫令遺民遷徙成周，曉諭遷徙原因，令其順服。
蔡仲之命	蔡叔之子蔡仲，能率德改行，克慎厥猷，此篇為周公請成王封蔡仲為蔡國國君之命令及勉勵。
多方	平亂後，周公代成王發布誥令，言夏桀、商紂行暴政，喪亡乃天命，周滅商而代之亦天命，告誡諸國要順服成王統治，叛亂乃違背天命之事。
顧命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輔助康王。記述成王喪禮時祖廟之陳設、警衛，末言在祖廟策命康王即位之儀式。

費誓	魯侯伯禽率軍攻打徐戎、淮夷時誓師之詞，於戰前對軍民告誡，宣布紀律，嚴申賞罰以威嚇。
秦誓	秦穆公自悔未能接納諫言而戰敗，認為軍國大事當諮詢老臣，強調好賢容善之重要。

《尚書》載古史，這二十篇大多數篇章的內容，或為指斥夏桀、商紂之荒淫無道，故天命不佑。或引以為鑑，或使誓師征伐，師出有名，並勸諭、恫嚇商之臣民，勿違天命，歸順成周。既有夏太康、夏桀、商紂王等失德之君，遂使國家淪至民不聊生，遭到討伐、滅亡等下場，故這些篇章亦多涉及暴政、喪亂的形容，多撻伐、怨怒的情緒。

如〈泰誓上〉云：「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緬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言紂王窮奢極侈、暴虐無道，殘殺忠良、孕婦。〈泰誓下〉指責紂王：「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斷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控訴紂王自絕於上天，斷脛、剖心，親小人而黜賢臣，……種種失德無道的暴行。又如〈微子〉篇載微子棄紂去國前，與父師間的對話：

我用沉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沉酗于酒。乃罔畏畏，俾其耆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⁶⁷

言上天降災滅商，紂王沉酗於酒、敗德、橫徵暴斂，臣民亦皆不遵法度，違法亂紀，竟連祭祀之犧牲亦遭偷盜，……描繪出紂王在位時，朝政不綱，岌岌可危。以上這些亂世的景象、負面的形容，皆不宜出題。

二十篇中，尚有涉及國君死亡的篇章，如〈金縢〉載武王死，〈顧命〉載成王崩，皆屬出題之大忌，〈顧命〉因此完全未見出題，〈金縢〉僅有萬曆七年

⁶⁷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10，頁14b-16b。

(1579) 順天鄉試，出了一道「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此乃〈金縢〉文末為流言所惑的誤會冰釋，成王出郊親迎周公，否極泰來的敘述，一反先前天候異常的凶徵為吉兆，故得獲出題。

再者，前言《尚書》六體中，「誓」體特別不受考官青睞，表十一呈現的二十篇罕見出題篇目中，「誓」體就多達八篇，幾乎囊括所有的「誓」體⁶⁸。此類征伐、戰前之誓詞，內容較為簡短，八篇中除〈泰誓上〉有三〇三字外，其餘皆不滿三〇〇字，如〈甘誓〉、〈湯誓〉、〈牧誓〉、〈費誓〉等，篇幅皆極短，分別僅有八十八、一四四、二四五、一八二字，內容或指斥桀、紂等敵方之失德亂政，或雖未著墨於敵方之失道，而著重於戰前告誡軍民，但嚴申紀律，口吻嚴厲，充斥著肅殺之氣，倘從其中出題，很難據經文發揮符合儒家之道及冠冕堂皇的義理，甚至與儒者倡言的民本、仁政、德政等有所扞格。萬斯同即曾質疑：〈甘誓〉之孛戮，宛如：「商鞅、韓非之法，後世庸主之所不忍者，而謂古帝王為之乎！」又言：〈盤庚〉三篇，「大要迫之以威，動之以鬼神，初無體恤民下之意，此不足為有無，即不傳亦可」⁶⁹。言及這些戰前之誓詞或〈盤庚〉之文，內容不合儒家倡言的德政，諸篇確實因較乏冠冕的義理可發揮而較少出題。

再詳考〈盤庚〉三篇，內容乃記述商王盤庚遷都之際，對臣民的告誡，曉諭遷都之利與不遷之害。其中言及不遷之害處，恫嚇臣民從令，如〈盤庚中〉言：「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斬草除根，趕盡殺絕的口吻，即萬斯同所謂「迫之以威，動之以鬼神」，未能體恤臣民者。其他告誡處，或亦有為政至理。明代會試就曾從〈盤庚〉三篇中各出過一題，分別為正統四年(1439)「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盤庚下〉)、天順七年「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眾」(〈盤庚上〉)、弘治十八年(1505)「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慙；鮮以不浮于天時」(〈盤庚中〉)，可見〈盤庚〉仍有局部內容義理合適的經文可以出題，只不過可出的範圍、素材較少而已。

⁶⁸ 《尚書》五十八篇中，以「誓」命名、可歸類為「誓」體的有八篇。然〈胤征〉一篇，雖孔《疏》、程元敏教授將此篇歸為「征」類，蔡《傳》於此篇題解言：「此以征名，實即誓也。」于雪棠亦將之歸在「誓」類，故筆者行文用「幾乎」而不言「全部」。孔《疏》說見〈堯典第一〉篇題下《疏》語；程說見程元敏：《尚書學史》，頁88；朱說見朱岩：《尚書文體研究》，頁33；于說見于雪棠：〈《尚書》文體分類及行為與文本的關係〉，頁10。

⁶⁹ 萬斯同：〈古文尚書辨一〉，卷1，頁15a。

七、結 論

本論文以整理所得的《尚書》義試題為研究對象，使用歷史文獻分析法、統計法進行試題的分析研究。首先說明鄉、會試錄《尚書》義試題的搜集，以及各時期試錄、題數之分布，以交代文獻的根據。所掌握的會試試題科數六十二科、共二三五道題，鄉試三三七種、共一三三九道題，以明中葉至萬曆十年間的試錄傳世較豐富，其他時期較為零星。

考察試題的排序，大都依《尚書》五十八篇先後次序。每次所出四道題，皆取自不同篇章，並未有同一篇章重複命題的現象。《尚書》可分虞、夏、商、周四類，四類篇數懸殊。《尚書》四題的組成模式，以「虞商周周」最頻見，此種模式在會試或鄉試比例皆高達百分之六十三。且明代初期出題較自由，尚未形成明顯一致的共識，相較於中葉以後的出題，略顯試題分配不夠平均，有偏重〈虞書〉、〈商書〉的傾向。

由於〈周書〉篇數有三十二篇，占《尚書》篇半數以上，故〈周書〉於鄉、會試中，共出了七七八題，占百分之四十九·五，所見試題俱足的四道試題中，皆含〈周書〉題，以出二題為常見，亦不乏出三題者。不管是會試、鄉試，出題數由多到寡之排序皆同為〈周書〉、〈虞書〉、〈商書〉、〈夏書〉。雖就出題總數而言，〈虞書〉僅位居第二，不如〈周書〉，但〈虞書〉篇數僅有五篇，卻出了三八九題，占百分之二十四·七，且五篇中就有〈舜典〉、〈大禹謨〉、〈皋陶謨〉、〈益稷〉等四篇位居出題前茅，並未有罕見出題者，可見〈虞書〉才是考官出題的最愛，也是考生備考的重點。〈夏書〉則最為考官忽略，四篇中〈甘誓〉、〈五子之歌〉頗罕見出題，唯〈禹貢〉較受重視。特別的是，〈夏書〉在鄉試出題比例明顯較會試高，主要是因〈禹貢〉涉及九州地理，具頌美、順服朝廷領導之意，更適合在鄉試出題。

孔穎達據梅賾所上五十八篇本作《正義》之後，後代傳習多據此五十八篇本，含今文《尚書》三十三篇及新增的二十五篇古文《尚書》。自宋代吳棫、朱熹，已開始懷疑二十五篇古文《尚書》有偽作之嫌，真偽之辨，成為《尚書》學重要議題，考官是否會因質疑古文《尚書》的真偽，在出題時有所取捨呢？據表八「今文、古文出題數及比例」的統計，今文《尚書》的出題數、比例雖較古文高，但大抵與今、古文原有篇數的比例一致。熱門的出題篇章中，包含屬古文《尚書》的〈大禹謨〉、〈說命下〉、〈周官〉、〈畢命〉四篇；反觀出題數在

零至三次的罕見出題篇章二十篇中，今文有十四篇，古文有六篇，分別占今、古文原有篇數的比例：百分之四十二、百分之二十四。古文《尚書》罕見出題，不受科場重視的篇章比例，還較今文《尚書》低。此皆證明，考官出題時，古文二十五篇並未因真偽質疑，受到忽視，主要仍取決於篇章經文的內容義理。

至於考官所重的篇章、內容，從表六「《尚書》各篇鄉、會試出題數及排序」來看，熱門出題排序前六名，不管鄉試及鄉會試合計之排序皆為：〈洪範〉、〈大禹謨〉、〈益稷〉、〈禹貢〉、〈舜典〉、〈立政〉、〈說命下〉；接續則〈皋陶謨〉、〈呂刑〉，〈周官〉、〈畢命〉，諸篇排序略有參差、先後，但出題亦不少。這些熱門出題篇章，多為頌美吉祥的內容，多見頌揚三代聖君賢臣、關乎德行、施政與功績；或經文中關於設官、刑獄、教化、治術等與施政有關的論述，這些經文蘊含的義理，適合作為掄才的題目讓考生闡述，也是未來官員當深刻體會的。其中出題數最多的〈洪範〉，內容為治國之大法，篇幅又長，最受考官青睞，共計出過一五七次。從《尚書》六體觀察，則以「謨」體最常出題，其次為「典」體。

五十八篇中，鄉、會試皆未見出題的有九篇，合計只出過一至三題的共十一篇。這二十篇或指斥夏桀、商紂等暴君之荒淫無道，多涉及暴政、喪亂的形容。《尚書》八篇以「誓」名篇之文，全在罕見出題的二十篇之列，顯見「誓」體在出題時最受忽略。因內容除指斥桀、紂等敵方之敗德外，或於戰前告誡軍民，以嚴刑重賞恫嚇，近似法家的嚴苛，與儒家倡言行王道、德政，頗為扞格。加上篇幅短小，可取材少，較乏冠冕的義理可發揮。或涉及國君死亡的篇章，如〈金縢〉載武王死，〈顧命〉載成王崩的經文，皆為出題之忌諱。

以上透過出題的分析，以還原考官出題的考量，以及試題在《尚書》虞、夏、商、周四類，在今、古文中之偏重，並藉由統計數據，以呈現五十八篇在科場出題時熱門出題及罕少出題的情況。各篇出題的詳細情形，尚待一一考察，罕少出題的篇章，不盡然「一無可取」，皆不可出；熱門出題的篇章，也非全可入題，如〈益稷〉在鄉、會試共出一〇四題，會試、鄉試出題排序分別位居第二、第三，為熱門出題篇章，結尾一大段，更是常考的段落：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

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⁷⁰

有樂舞的盛況，加上君臣和樂融融，互相唱和、勉勵的描寫，使此段既涉頌美又關乎政事的經文，在鄉、會試中出了十九題。題目或長或短，頗多變化，但唯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三句負面的形容，始終被略過，未曾出題。

本文以上這些考察，除有助於還原明代考官出題的權衡外，也有助於了解學子研經、考生備考的狀況，以及藉以研究科舉用書的編纂、取捨。又可作為其他諸經出題的參照，也可與二、三場論、策、表、判的出題比較。

且明代科舉制度既承元制而修正，清代科舉又承襲明制而調整，對明代經書考試的研究，自然也可作為認識其他朝代經書考試的基礎。以元代為例，張祝平曾據元代劉貞所編《類編歷舉三場文選詩義》，研究元代《詩經》試題，獲得元代出題已是「重〈雅〉、〈頌〉而輕〈國風〉」的結論⁷¹，和筆者對明代《詩經》出題的分析一致，可見考官出題的考量，雖異代而多同趨，可以互參比較。又，元統二年（1334）進士王充耘在其《書義主意》釋〈無逸〉，認為除「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兩段外，「餘題多有凶惡字樣，必不出」⁷²。考察明代鄉、會試出題，所舉兩段亦是出題的焦點，雖亦有出於兩段以外，但「有凶惡字樣，必不出」，亦道中明代科場出題的實情。

王充耘又作有《書義矜式》⁷³，《總目》云：「充耘即所業之經，篇摘數題各為程文。」⁷⁴所錄乃元代備考參用之《尚書》經義範文，張思齊曾為文探討，文中指出：《尚書》五十八篇中，王書收有範文者三十四篇，有二十四篇沒有範文，因言：

這二十四篇文章原本也是有題目而且也配有範文的，不幸的是它們在流傳的過程中亡佚了。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書義矜式》，其出題範圍為《尚書》五十八篇文章中的三十四篇。換句話說，現存《書義矜式》，其篇幅

⁷⁰ 孔安國傳，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義》，卷5，頁15a-17b。

⁷¹ 張祝平等：〈元代科舉《詩經》試卷檔案的價值〉，《中國典籍與文化》2000年第1期（總第60期），頁81。劉貞一書的介紹，亦可參張祝平此文。

⁷² 〔元〕王充耘：《書義主意》（《四庫未收書輯刊》第10輯第1冊，影印清道光影元刻本），卷5，頁33b-34a。王氏生卒年不詳。

⁷³ 王充耘：《書義矜式》（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8冊）。

⁷⁴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12，頁44a，「書義矜式」條。

僅是王充耘原來著作的三分之二。⁷⁵

因此文中斷言「現存《書義矜式》是一個殘本」⁷⁶。筆者對此推論，有所保留。由於文獻散佚，無法藉由元代試題的統計推論，僅以王書二十四篇未有範文之篇章，用與筆者據搜集的明代各篇出題數統計對照，情況如下表：

表十二 《書義矜式》未收範文篇章與明代鄉會試出題數比較

《矜式》 未收範文 篇章	甘誓	五子之歌	湯誓	湯誥	盤庚中	盤庚下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泰誓上	泰誓中	牧誓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酒誥	梓材	無逸	蔡仲之命	顧命	康王之誥	罔命	文侯之命	費誓
會試題數	0	0	0	2	1	1	0	0	0	0	0	0	0	0	0	3	4	4	0	0	1	4	1	0
鄉試題數	0	2	0	5	1	2	0	0	0	1	1	0	1	4	3	16	10	30	0	0	7	22	5	2
合計	0	2	0	7	2	3	0	0	0	1	1	0	1	4	3	19	14	34	0	0	8	26	6	2

再進一步考察《書義矜式》收有多篇範文者，常常也是明代鄉、會試熱門的出題篇章，如〈洪範〉，不管是《書義矜式》所收範文，還是明代鄉、會試出題數總計，都是遙遙領先、一枝獨秀⁷⁷。反觀上表二十四篇未收範文者，從與明代鄉、會出題數的比較中可知，多數是考試所罕見出題者，僅少數如〈酒誥〉、〈梓材〉、〈無逸〉、〈罔命〉諸篇例外，或許是王充耘恰好未有相關佳作可收入之故，但顯然該書二十四篇沒有範文的現象，應多是作為科舉用書、配合考試出題傾向的取舍所致，並不能用以說明《書義矜式》是不全的「殘本」。

由此可見，對明代科場考官出題原則、趨向有所了解，對於科舉用書的認知，才有憑藉的基礎，亦有助於進行其他朝代經書考試的研究，此為後續可努力的方向。

⁷⁵ 張思齊：〈王充耘的《尚書》研究〉，《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3卷第3期（2014年5月），頁27。

⁷⁶ 同前註，頁30。鄭翠蘭：《王充耘《尚書》學研究》（重慶：重慶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4年），指出《書義矜式》：「其中有些篇章，只存在篇章名而其下並沒有摘錄語句為文，〈甘誓〉、〈湯誓〉、〈湯誥〉、〈牧誓〉4篇，就是如此。還有一些篇章便毫無收錄，如〈五子之歌〉、〈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金縢〉、〈大誥〉、〈微子之命〉、〈酒誥〉、〈梓材〉、〈無逸〉等等。」（頁3）雖點出這些缺收的現象，但並未進一步解釋、說明其故。

⁷⁷ 《書義矜式》中，〈洪範〉收十一篇範文最多；科舉所重的〈虞書〉五篇，範文也偏多，於此可見其扣合科舉出題之一斑。

明代鄉會試《尚書》義出題考察

——以考官出題偏重為主的討論

侯美珍

本論文據明代鄉、會試錄等文獻，整理出鄉、會試《尚書》義共一五七四道試題，使用歷史文獻分析法、統計法進行試題的分析研究。考察《尚書》義的出題，不因今、古文之別而有所輕重，主要繫之內容義理。虞、夏、商、周四類中，以〈虞書〉最獲青睞。五十八篇中，以〈洪範〉、〈大禹謨〉、〈益稷〉、〈禹貢〉、〈舜典〉、〈立政〉、〈說命下〉等篇最常出題，內容或偏向頌美吉祥，或讚揚聖君賢臣的德行與功績，多與設官、刑獄、德政、治術等政事相關。未出、罕出的篇章，則多涉夏桀、商紂荒淫暴政的指斥，或涉喪亂、死亡之形容，或較乏冠冕的義理可闡發。

關鍵字：《尚書》 科舉 鄉試 會試 明代經學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Book of Documents* in the Provincial and Capital Exams in the Ming Dynasty, Focused on the Preferences of the Exam Designers

HO Mei-chen

This article analyzes a total of 1,574 essay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meaning of the *Book of Documents* that were listed in the Ming Dynasty records of provincial and capital exams, using historical document and statistical approaches. Disregarding distinctions of new and old text,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questions mainly focuses on their meaning. Out of the chapters classified as *Yu, Xia, Shang, Zhou*, the *Yu* was favored by the examiners. Among the 58 chapters, the most commonly used for imperial examinations were the “Great Plan,” the “Counsels of Great Yu,” the “Yi and Ji,” the “Tribute of Yu,” the “Canon of Shun,” the “Establishment of Government,” and the “Charge to Yue II,” the contents of which either were laudable, auspicious and positive, or else extolled virtuous and capable courtiers involved in selecting officials, judicial justice,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a country. Chapters that were rarely used include those that involve reprimands of the Xia king Jie’s and Shang king Zhou’s licentious and violent behavior in governance, accounts of death and disorder, or topics unsuited to explication by Confucian scholars.

Keywords: *Book of Documents* imperial examination provincial exams
capital exams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Ming Dynasty

徵引書目

- 丁紹軾：《丁文遠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5輯第25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 于雪棠：〈《尚書》文體分類及行爲與文本的關係〉，《北方論叢》2006年第2期（總第196期），頁8-11。
-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 毛奇齡：《古文尚書冤詞》，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王充耘：《書義矜式》，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書義主意》，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10輯第1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 孔安國傳，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義》，收入《十三經注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
- 田藝衡：《留青日札》，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12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全祖望著，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 朱岩：《尚書文體研究》，揚州：揚州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08年。
- 朱彝尊撰，林慶彰等主編：《經義考新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朱鶴齡：《愚菴小集》，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1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李維楨：《大泌山房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50-153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
- 李景隆等：《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年。
- 李賢：《古穰集》，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4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沈家本等修，徐宗亮等纂：《（光緒）重修天津府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690-69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邵寶：《容春堂集》，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5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侯美珍：〈明清科舉取士「重首场」現象的探討〉，《臺大中文學報》第23期，2005年12月，頁277-322。
- ：《明代鄉會試《詩經》義出題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4年。
- ：〈明代鄉會試《禮記》義的出題及影響〉，《臺大中文學報》第47期，2014年12月，頁89-138。

- 姜亞沙等主編：《中國科舉錄彙編》，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10年。
-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
- 庫勒納等奉敕編：《日講書經解義》，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唐寅：《唐伯虎先生全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9年。
- 孫緒：《沙溪集》，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6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翁方綱：《復初齋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5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張表臣：《珊瑚鉤詩話》，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7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張思齊：〈王充耘的《尚書》研究〉，《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3卷第3期，2014年5月，頁25-31。
- 張祝平等：〈元代科舉《詩經》試卷檔案的價值〉，《中國典籍與文化》2007年第1期（總第60期），頁79-86。
- 張朝瑞：《皇明貢舉考》，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82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張寧：《方洲集》，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4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曹安：《讜言長語》，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陳子龍：《安雅堂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87-138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陳長文：〈崇禎十三年賜特用出身科科年考實——兼談明代進士題名碑的立石問題〉，《文獻》2005年第3期，頁168-175。
- 陳恆嵩：〈明代科舉與《尚書》題目——以《明代登科錄彙編》為考察中心〉，收入丁原基等主編：《第一屆中國古典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聖環圖書公司，2010年。
- ：〈明代會試《尚書》義試題探析〉，發表於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儒道國際學術研討會（六）：明清——開展二十世紀國學研究新視野」會議，2014年11月1-2日。
- 陳雅言：《新編書義卓躍》，明人景鈔正統年間汝州王本刊刻本，名古屋：蓬左文庫藏。
- 陳寶：〈《尚書》「十體」的文體學價值〉，《湖南社會科學》2007年第3期，頁145-148。
- 陳懿典：《陳學士先生初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78-79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 程元敏：《尚書學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8年。
- 程廷祚：《晚書訂疑》，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4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楊士奇：《東里集》，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38-123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館，1983 年。

萬斯同：《羣書疑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14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寧波市天一閣博物館整理：《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鄉試錄》，寧波：寧波出版社，2010 年。

——：《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會試錄》，寧波：寧波出版社，2007 年。

臺灣學生書局編輯部輯：《明代登科錄彙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 年。

趙佑：《尚書質疑》，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4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蔣秋華：〈陳雅言與《書義卓躍》〉，收入傅永聚、錢宗武主編：《第三屆國際《尚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線裝書局，2015 年。

蔣善國：《尚書綜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

鄭翠蘭：《王充耘《尚書》學研究》，重慶：重慶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4 年。

錢茂偉：《國家、科舉與社會——以明代為中心的考察》，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 年。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00-70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戴鈞衡：《書傳補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5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藜光閣主人輯：《經文戛造》，收入《晚清四部叢刊·第五編》第 1-6 冊，臺中：文听閣出版公司，2011 年。

顧炎武撰，黃汝成集釋，樂保羣、呂宗力校點：《日知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顧景星：《白茅堂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205-206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 年。